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三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目 录

- 一、云南建党前的一些情况.....杨青田 (1)
- 二、云南地下党产生前的政治背景
.....唐用九 (11)
- 三、忆赵琴仙同志.....浦光宗 (17)
- 四、回忆李金三.....~~王~~象尧 (27)
- 五、狱中遗书.....~~王~~德三 (35)
- 六、黄洛峰同志答问..... (49)
- 七、介绍张经辰同志——致张念先同志函
.....冯素陶 (52)
- 八、回忆张经辰.....张清辰口述 (56)
- 九、同他握最后的手.....何月华 (61)
- 十、我参加工运、军运、
和统战工作的概况.....刘浩 (64)
- 十一、革命生活片断回忆——在国民党空军
中的活动及其他工作.....郭佩珊 (85)
- 十二、羊街机场拖武装.....唐冠之 (148)
- 十三、樊子诚同志追悼会悼词..... (160)
- 十四、赵国徽同志追悼会悼词..... (164)

云南建党前的一些情况

杨 青 田

五四运动以后，云南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一般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欺凌的激愤和对国内政治状况不满的心情，越来越高涨了。“五四”前后，昆明的工人商人也和青年学生一起积极的参加了反帝运动（当时主要是反日）。在青年知识分子方面，“五四”冲破了过去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沉闷空气，越来越多的人滋长着过问政治的倾向。在“五四”前夕，省立一中曾发生反抗以奴役学生为目的（的）“军国民教育”的事件，集中的表现了当时知识青年们对军阀政治憎恶的心情。“五四”以后，省学联合会刊（周刊）逐渐从以反帝言论为主转向以批评攻讦政府揭露政治黑暗为主。约在一九一九年末，少数青年出版了“滇潮”月刊（在省一中，这个较进步的刊物，断续出版了约二年以上）。约至一

九二〇年，有少数教员，也出版了“民觉”日报，支持新文化运动。这期间专门贩卖新书报的“新亚书店”和“白新社”也出现了，随着国内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大批新书刊涌到了昆明，这方面的出版物几乎应有尽有。在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刊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但数量都比较少些，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则数量比较多（其中片断介绍的多，系统的很少），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有了。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有深厚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真理性和说服力强；当时喜欢看各种政治学说的青年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以后，省学联曾接到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一封信、鼓励多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给了参加学联活动的一部分人以启示。张伯简同志，大理人，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患肺病，不久即死，有著述出版。他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当系云南人中入党最早的）。

约在一九二〇年初，参加省学联工作和出版《滇潮》杂志工作的一份部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叫“大同社”（平时内部称之为T.T.A.，

T.T.是大同的音译，A是代表英文Association，最初只六、七人，后发展到二十人左右），章程以“改造社会”为宗旨。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的一部份就是《滇潮》月刊的主干。同时还在文林街天君殿巷办了一个义务学校，招收贫穷失学儿童，免费供给书本文具。还登报征求组成团体去法、比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因当时需旅费四百元左右，多数都筹不足，结果只有个别的人出国求学）当时新思潮的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反宗法社会、反旧礼教、主张妇女解放等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同时也萌芽着剥削可耻，劳工神圣，“经济平等”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秘密团体的宗旨反映着一部份较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所谓“改造社会”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理想，怎样改造社会却拿不出办法来。一九二一年以后，这个团体的成员，有的毕业回家，有的外出升学，就无形中瓦解了。

五四运动以后，本省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外出升学的热潮，其中以到北京的为最多，当一九二二——二五年期间，已入校和准备投考的滇籍在京学生大约在二百人左右。原来大同社的成员

升学的也大都到了北京。他们和其它一些较进步的留京学生组织了一个“云南革新社”，出版一份《革新》周刊。这是一个公开组织，出版物多数寄回云南，也分寄给国内各大都市，及在日本的云南留学生，但因经费关系常不能按期出版。言论内容大体围绕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纲领作为方向，但还没有党的领导。约在一九二三——二四年间，“革新社”的名称改为“新滇社”，刊物名称改为《铁花》，仍为周刊。一九二四年起，“新滇社”员有少数入了共青团（刘平楷、马会云、徐景湖、杨青田等四人。当时云南学生中还有一个团员赵济，即后来的托派岑纪，他没有参加“新滇社”）。从此该社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党的领导的各种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刘平楷等四人和赵济都入了党。以后从社员中发展的党员逐渐增多，在一九二五年——二六年间入党的有王振甲、张舫、张炽、杨立贤、李辅仁、徐克家、李鑫、张经辰等（二六年我在广州，在北京入党人数不完全清楚）。入团的有胡德富、尹光南等（人数更不清楚）。王德三同志及其兄王复生，因生活关系常轮流休学教书。王

复生是“新滇社”干事之一（不是党员）；王德三一九二五年暑假由陕北绥德师范教书回来，在北京入了党，暑假后又到榆林中学任教，是年底回京，也参加了“新滇社”，并为干事之一。

北京云南学生的右派也组织了“云南青年社”，主干人物是纪人庆、王本乾、杨天理、杨适生等。与“新滇社”互争中间分子，但“青年社”人数只二十余人（“新滇社”人数将近一百人）。“青年社”出版有《云南青年》周刊，拥护西山会议派，并派其社员到广西平马（田东）与范石生勾结、准备拥范回滇执政。

一九二五年“新滇社”在武昌（高师），南京（东南大学），上海等地云南学生中成立了分社，并与天津唐山云南学生刘治熙等及留日学生张天放等取得联系（留日学生也分左右两派，右派骨干是周枕云等）。一九二六年初，在广州成立分社，并与李国柱等在昆明组织的“青年努力会”取得联系。一九二六年以后，“新滇社”中的党员逐渐脱离学校参加了大革命期间的军事政治工作（也有非党员），骨干减弱，更主要的是这种地方性的组织，已不能适应当时已经高度开展的以工、农、青、妇划分的群众运动的新的形

势和全国统一性的军事政治工作。“新滇社”也和当时各省类似的这种地方性组织一样，已完成其短暂的历史任务，从一九二七年初起，北京总社和各地分社从逐渐停止活动、到大革命失败时便无形消灭了。

当一九二五年底以前，在京沪等地的滇籍党员已有少数调至广州工作（有赵济、赵适然、吴少默，陶光潮、杨青田等），工作都分配在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作军、师、团各级政治工作。一九二六年夏以前（即誓师北伐以前），从京、沪、武汉、宁到广州的党团员更多了（有王德三、张舫、徐克家、唐太昆、王味泉及团员戴曙等，同时还有党外的原“新滇社”员也来到广州（有张景初、夏崇光等），还有从云南到广州的男女青年赵琴仙、周霄、罗采、邬少兰等。这时集中在广州的滇籍党团员和党外青年（连原在广州读书的云南青年冯素陶等）不下五十多人。王德三同志和我们（当时德三同志在黄浦军校任教）商量，申请党批准，把到广州的滇籍青年在大沙头第三军军官学校内（当时杨青田在该校兼任教员）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为期三月，学员共有三十二人，开学时间在一九二六年

六月。在此以前，“新滇社”广州分社请准送了周霄、罗采二人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后从云南出去的青年，还有入讲习所第二期的）这是北伐前夕的情况。其后“政治训练班”结束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北伐前夕（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党派杨青田回滇工作，任务是筹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同时发展一批党团员在国民党部中形成核心领导（当时我党对群众政治军事工作，一般都利用国民党组织的形式去做，党团员都同时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对国民党和群众运动进行领导），并准备成立我省的党组织。另外还由国民党中央派王复生（国民党左派）回滇，同杨青田会筹组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杨、王的职务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员”，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林祖涵同志的名誉委派。关于杨青田回滇后党内的宣传组织工作及通讯联络等，由我党中央组织部傅烈同志具体布置）。杨于六月中抵昆明（阴历五月十六日）因工作经验缺乏，在河口检查护照时即被河口督办署警察局长注意（当时唐继尧政府严防“新滇社”分子及所谓“赤党”和国民党人入滇，因唐正派王九龄到洛

阳与吴佩孚联络，夹攻两广，並已派有先遣队至麻栗坡广南一带，故对河口出入，特别对青年人入口稽查甚严。同时因杨在五四运动时，在昆明认识的人很多，也易被发觉），尾随至昆明（杨当时也察觉到，但已入境，无法摆脱），三四日后，昆明军政界方面，即轰传“国民党派人进来宣传赤化”，“政府要捕人”等。在此情势下，杨的活动受到限制。仅与“云南青年努力会”负责人李国柱在省一中图书室会晤几次，约定暂时不作活动，俟风声较为平息，再行工作，杨、李也尽可能少会面。此外，杨和其他过去认识的人也接触过几个，但因离滇五年多，各人情况的变化弄不清楚，也不便深谈，只有暂为等待，准备做个教员作掩护。到了阴历五月三十日（学校六月一日放暑假），唐政府突然派军警到省一中捕去八个学生，並找杨青田和杨的像片（因杨系该校毕业生），同时侦缉队到杨寓所（布珠巷十四号）搜查，适杨不在。次日，杨即乘火车离昆，准备找沿线各县旧时同学暂避（当时在昆明市郊都一时找不到相当的社会关系作掩蔽）。在蒙自、文山、西畴，都寻访社会关系无着，在西畴生病耽延九日，决定从越南河阳回广东报告请

示，因无护照走不通，仍返麻栗坡，到豆豉店因患重病（恶性疟疾）住了四月，才回广东，在海防遇王复生，同至广州。时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到广州后（时革命军已北伐），与王德三同志商量，此时原办的政治训练班刚结业，决定分配九人先回滇（唐太崑、赵琴仙同志等），把其余二十三人连同由北京来的一人，组成宣传大队到江西加强第三军政治工作（该军原系滇军改编），向党请示批准同意。並指示由杨青田任宣传大队长带队去江西（因当时杨病尚未痊愈），云南我党党务由王德三同志回滇负责，仍派王复生回滇筹备国民党省党部。

在一九二六年秋，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罗采、周霄、邬少兰（周后来入党），已先后回滇。大约一九二六年左右，赵琴仙等陆续回滇。是年十一月前后，赵祚传，毕昌杰等也在广州，当时入讲习所的云南青年，增多了几个。（十二月宣传大队启程去赣，分配回滇的九人究竟有几人到昆、杨青田不清楚）。

这期间前后，还有从北京直接回滇的李鑫同志（木子）和从上海回滇的张永和，都未经过广

州，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到云南（马逸飞同志也许知道他们的具体任务怎样，当时我党领导云南的工作是以广州为中心，北伐后也设有中央的执行部在广州）。

到王德三同志回滇后（约在一九二七年春）云南才正式建党。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晚）

（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

云南地下党产生前的 政治背景

唐用九

一九一六年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后，唐继尧大发其军阀野心，亟图囊括滇、川、粤、桂、黔、湘六省，渡江北上以争霸中原，表面假靖国护法之名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路线，而实质是与北洋军阀的“残民以逞”并无二致。地瘠民贫的云南不堪征兵派款，横征暴敛，以致烟匪遍地，人民日愈水深火热，已开始酝酿其残暴的统制，而又寻不出更好的政治出路。五四运动前后，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知识份子，在要科学要自由（民主）的呼声，初步发现解决国家前途的一线曙光，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社会人民作了一些灌输新文化新知识的宣传活动，并纷纷要求赴京沪游学，以寻求新知识和新政治路线，以求改造云南的旧局面，而致力于富国强兵之道。此时在死气

沉沉的云南境内，以昆明为首的大中城市，群众运动和各種報章雜誌的輿論，曾在短時期內呈現一種活躍景象，以唐繼堯和封建勢力代表人物為對象，予以攻擊，唐繼堯雖作殘酷鎮壓，但越更激起人民的憤怒；甚至包括其部屬中的少壯派在內，也認為非倒唐不足以解決雲南的出路問題。顧品珍之所以能輕易趕走唐繼堯，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唐去顧來，而顧與金（漢鼎）楊（綦）三派軍事勢力同床異夢，明爭暗鬥，內哄不已。凡所措施與唐無異，貪污成風，盜賊橫行，人民深感以暴易暴，每況愈下。

唐繼堯第二次回滇打死顧品珍，重新取得政權後，由於孫中山對其回滇曾發過制止令，因而由一向親孫而變為反孫，特別反對孫之“聯俄、聯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與北洋軍伐遙相呼應，樹起所謂“討赤”的旗幟，接受國家主義派的獻策，組織民治黨，明目張膽與國民黨對抗；甚至與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等電訊往還；及與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首腦鄒魯，楊庶堪等暗通消息；又復聯絡陳炯明、劉振寰、楊希閔等兩粵地區反動武力合謀反孫反赤，雖經孫

中山数次派人来滇劝说，并送来副元帅印，但唐坚持不理。

唐对内则竭力扩充兵力，利用土匪为爪牙，培植乃弟唐继虞为核心的更加亲信的武装力量。因此政治上愈加腐败，社会秩序日愈混乱，人民痛苦愈深，众叛亲离，道怒以目，朝野上下汲汲不可终日；在外交方面，讨好英、法、尤其对法帝国主义表示亲善，以便向其购买军火，加强军备，从事内战。由于其反动的内政外交政策日愈不得人心，对部属和人民一味采取防范压制手段，因而更引起他和人民之间，他和军队部属之间的互相猜疑日愈扩大，再加以当时在广州国共合作的新兴势力的光芒影响，倒唐已成为全省军民上下一致的要求。因此，遂于一九二七年发生“二六”政变的倒唐运动。

云南地下党一九二七年展开

工作的部分情况

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春冬之交，大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全国掀动，云南内部亦跃跃欲试。由革命根据地广州纷纷回云南来了一些

党团员，于“二六”政变之后，由王德三同志（又名王懋廷）奉党命回滇，加强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开始首先成立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因借用兴隆街云南法政学校的宿舍为党部地址，社会上称为“法校党部”，通过吸收左派国民党员，经过教育考察之后，而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展对象以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各学校的教职员居多，也有部份小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和较年轻的机关职员。在此之先，以李宗黄、张邦翰、张禄、胡瑛等为首的右派国民党省党部早经组织成立，因地址在园通街，社会上称“园通派”。同时在龙云指使之下以李培炎、彭嘉猷、李表东等为首亦成立国民党党部于省议会，社会上称为“舅子团党部”，一时形成鼎足而三的三个国民党党部。“舅子团党部”活动力较差，不久即瓦解，合并于“园通派党部”。随着北伐大军的宁汉分裂，左派法校党部和右派园通党部的斗争也日愈剧烈起来，我党对各界的统战工作也日愈扩大，除原有的省教育学会完全被我党所掌握外，尚另组织起来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包括一切社会团体在内的各团体联合会，以为组织各种力量，推动工作，对反动势力

进行尖锐斗争的统战机构。对军事的统战工作也进行得深入而有力，尽管龙云是坚决反对我们的，但其部下较拥有实力的卢汉（九十八师）和朱旭（九十九师）都表示愿接近我党，两师的政治部全由我们组织，目的想在下级军官及士兵中发展组织；此外又组织各种毕业同学会，以扩大对社会上各方面的联系，加强统战工作的力量。当时云南各派军阀中，仍以唐继尧所拥约万人以上兵精械利的军队为最强。我们看出唐继尧急欲另找出路，曾对他秘密地进行了许多工作，同意其集中所有力量于寻甸、曲靖一带，站在我方取道川黔北伐，实际即以支持武汉方面以对付叛变革命的宁方蒋介石。继因唐继尧病死，计划未得实现。

唐继尧死后，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军长内哄，胡、张、李、共同突然围攻龙云，即所谓“六一四”政变，因龙云始终对我党采取反对态度，“六一四”政变我党事先即通过个别党员秘预其谋。在龙、胡、张、李在曲靖城外料角山的军事冲突以及唐继虞西下围攻昆明之战，我党曾以各团体联合会名义推派代表调停内战，分别接触，亟图加强其互相之间的矛盾，长